

被社会锻造出来的集体无意识

——评楚荷的中短篇小说

段平山

(韩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潮州 521041)

[摘要] 楚荷《落地为兄弟》《老莫》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所展示出来的内容不是那种琐碎细微的针对社会生活的个体感性经验,而是揭示出了一种被社会锻造着的国民心态,其创作表征出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不断深化和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 楚荷;现实主义小说;集体无意识;社会矛盾;国民心态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1-0028-05

On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from Social Experience

——Review on Chu He's Short Stories and Novelette

DUAN Pings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Hanshan Normal College, 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 China)

Abstract: Series of short stories and novelette by Chu He, such as Landing Is Brothers, Mr Mo, show the content is not trivial for individual emotional experience to social life, but reveal national mentality from social experience. His cre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its realistic novels' deepening and strong vitality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Chu He; realistic novel;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social contradictions; national mentality

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关于无意识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科学家(包括美学家、文学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了有关人类的各种意识层面,以及意识的各种表现特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体系。无论是理性的学术研究还是感性的文学创作,对于“人”的无休止的追问总是能够凝聚着无限的知识,并能够包藏着万有的信息,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追问”是无头无尾、无始无终的,但是,只要能够在“追问”的过程中,以丰厚浑圆的形式感产生魅力,那么,这些知识与信息所承载着的启迪意义就能够永远动人、永远诱人并永远不可能走向终结。

受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当代的作家(尤

其是当代的小说家)在他们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调整、改换着针对“人”以及“人性”的追问方式,从而使文学的基本要素(如情节、人物、理性、情感、题材、主旨、叙事性、抒情性等)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异。进一步说,由于这个变异,文学诸“要素”之间产生了相互的失衡,甚至使文学作品失去了整体构架方面所应有的丰厚浑圆。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局部的丰厚浑圆使读者从这个“失衡”的背后别见洞天,感悟到另外一片生机,那么,这样的文字(小说)仍然不失它应有的启迪意义和认识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通过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来提高文学作品的认知功能要比通过强化人的审美情趣来提高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更为重要,也更加具有启迪

收稿日期: 2012-12-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期中国作家小说创作理论研究”(12CZW006)

作者简介: 段平山(1964-),男,甘肃民勤人,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意义。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情感、思想和愿望。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内在的。有的是被公开表达出来的，而另外的一些则处在一种朦胧未明的潜隐状态。对于作家来说，关注那些公开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关注那些潜意识存在着的思想感情则是另外一种创作方法，不同的创作方法体现出作家的不同的“认知领域”和完全不同的“文学的作用方式”。

湖南籍作家楚荷（原名谭进军）在近几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以其平实婉约、流畅舒缓的节奏绘出了一幅当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图。除此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楚荷的小说直接针对社会公众心理，触及到了作为一个民族（或群体）在“这一个”特定的时代里的智慧、情感以及意识的演进方式。换言之，他的小说揭示出了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中国国民的集体无意识。

—

所谓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感染着的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够相互的影响并相互的感染，就是因为有着极其稳固的社会结构（包括政治体制以及管理、运作的方式等）。“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典型的群体的社会心理是无处不在的，有时候表现为对于偶发事件的集体参与，有时候表现为对于必然性事件的集体失语。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对于各种浮躁行为、低俗行为以及罪恶行为的集体冷漠和集体麻木。

中篇小说《落地为兄弟》所讲述的是工厂改革问题。伍子是一个对“改革”很不满意的工人，在他看来，所有的改革都意味着分配的进一步不公，他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放纵着自己，吃喝嫖赌，不仅对“改革”发牢骚，也对厂长们发牢骚。由于这个原因，害怕惹事生非出乱子的那些厂长们最后决定把伍子的工资待遇提高一点，工作职位改变一下，于是，伍子成了厂里的保卫科长。自从当上了保卫科长以后，伍子的言行与之前的就大不一样了，在之前的工友们看来，伍子彻底地背叛了工友们之间的情意。可是，在厂长们看来，伍子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之前的情形是厂长们对伍子讲“兄弟情”，现在的情形则是伍

子给工人们大讲“兄弟情”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通的，也是很具有普遍性的。然而，就事论事，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解读方式。小说的作者是从“无意识”的角度来描写的。伍子的变化“不留痕迹”，弄得工友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是保卫科长，所以他的言行当然是“保卫科长”这一身份的言行，与伍子这个人没有多大关系。并非是伍子变“坏”了，而是“保卫科长”这个角色有问题。同样的道理，工人们、厂长们该怎么说，该怎么想，该有怎样的行为举止，这都与他们自己的性格无关，与他们的信念、价值观念无关，都不过是“身份”或“角色”的需要。一旦角色或身份进行了替换，马上就能够以新的身份或新的角色显示出新的形象特征。因此，可以说楚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没有“个性”特征，却具有群体“特征”。作为群体特征的人物，虽然各有各的追求，但是，所有的追求都是无意识的冲动。究竟自己的追求能够具有怎样的意义，他们自己不仅不清楚，而且也并不关心。在《菊子》这篇小说中，菊子追求着“公务员”，《月女》中的月女追求着“米雪的歌”，《庖丁解牛》中的鹏宇追求着心目中的那个“高素质的哲学家”。虽然他们各自的追求是很执着的，但他们并不晓得执着的动因。其实，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真正的“成功”，因为即便是获得了自己的追求目标，也只能使他们陷入了更大、更深的欲望当中。当“月女”听到了米雪的歌之后，并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鹏宇欣赏到了华君，欣赏到了教授之后，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惆怅，这个惆怅就是对于文化“真谛”以及艺术“精髓”的狂热的想象。总之，所有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不需要过程的追求，它与通常人们所说的“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因为，有理想就会有奋斗，有奋斗就会有结果。而楚荷小说中的群体人物所具有的“追求”却不一样，它既没有“过程”也没有“结局”，说到底，这些所谓的“追求”都是一些近似于幻觉的与个体经验不存在任何关系的无意识。

在《老莫》这篇小说中，老莫与妻子小莫相互羡慕、相互欣赏，他们过着平凡安静的日子，由于工厂的改革，作为工人的老莫被下岗了。起初，老莫满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华可以在外面的世界谋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可是事与愿违，他最终没有找得到工作，只好一家人合力开了一个饮食店。但由于经营

不当,不得已关了门。再到后来,他决定帮助别人送煤气、干苦力活,结果却力不从心,只好放弃。当保安、当门卫最终也不成,于是,身心疲惫的老莫只好呆在家里练习书法。妻子小莫眼见家里没有买菜的钱,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出去碰一碰运气。由于长相好看,所以,一步一步地被这个“外面的世界”所容纳,最终她进入了情色场,当上了三陪女。作者并没有刻意地去揭示造成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更没有用情绪化了的语言进行针对性的评点和感叹,倒是对人物(老莫和小莫)的心理态度进行了一些细致而又微妙的描摩。可以说,小说主要是描写了他们的无意识表现。在小莫的心目中,丈夫老莫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还没有被别人发现的“千里马”。所以,尽管她对于丈夫说话的语气和语调有所变化(在没有挣到钱的时候,说话细声细气,当挣到了很多钱的时候就有点粗声粗气),但是,她对于自己的态度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她从没有瞧不起丈夫的念头,但她的行为、言语、姿态已经形成了一种“瞧不起”。对于老莫来说,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有力量的,有力量的找不到工作,而没有力量的却能够挣到钱,这种现象是由于社会上的“伯乐”太少而已。所以,他的期待与他的忍气吞声是针对个别的人和个别的事。至于盛行于整个社会上的价值体系究竟有没有变化,怎么变化了,他从没有想过,也没有机会去想,反正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有才干的。因此,他呆在家里吟诗、下棋、喝酒、写毛笔字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有所追求的人,但实际上,所有的追求都是无意识的冲动。老莫与小莫的言行、情绪、思想、念头都与他们的性格无关,所有的行为举止都来自于一种“本能的反应”,就像被操作着的某种“程序”一样,一旦有了外界的信号,就会产生相应的“信号的反应”。老莫唯一的一点认真的反思就是(在小说结尾处)当他一边吐血,一边继续喝酒的时候。小说这样写到:“老莫这回没想叫王羲之、怀素那些人来,老莫这回想到的是黑白无常”。^[1]

虽然无意识是一种不自觉的心理状态,但是,这种不自觉并不是“土生土长”出来的,更不是“老天爷”的安排,而是社会“引领”的结果。归根结底,“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决定着“集体无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把社会问题与集体无意识问题相互割裂开来,那么,不管能不能够走向深入,至少在

文学领域中,这样的创作会削弱文学的社会意义。

从表现特征来看,集体无意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也具有代代相传的潜能。然而,由于无意识经不起社会风浪的磨炼和考验,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集体无意识恰恰是脆弱的,它顺势而来,又顺势而去,有情绪却没有思想,有说法却没有理论。任何一个风平浪静的社会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无意识,而且越稳固越好,越稳固就越能够促使一些人通过抽象的“精神分析”“心理分析”以及“原型”来制造一些貌似科学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楚荷的小说是针对集体无意识问题的一种别样的思考,他通过文学创作向读者揭示,国民的心态并不是由于国民自身的原因。相反,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所有的冷漠、所有的失语、所有的软弱与妥协以及所有的麻木其实都是社会的有意识地锻造的结果。

二

上个世纪90年代盛行于文学界的“现实主义回归”热潮已经从各个方面揭示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很多的作家逐步将叙述的视角移向了社会底层,普通下岗职工、农民以及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这样的文学“多少有一种平民情感的本能冲动,这也正是其感人的地方”。^[2]不过,“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影响之下的这类文学作品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叙述姿态的个性化,很多时候这些作品以调侃、嘻笑怒骂为基调的语言,戏仿政治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按照洪子诚的观点是“以调侃的姿态来迎合大众看客的爱好的心理”。^[3]二是为了捍卫文学的职责,为了维护创作者主体的“被认同感”,将“关注现实,关注民生问题,关注弱势群体”的创作旨趣纳入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视域当中,作为文学衰败、文学退却现象的一种修补剂。由于这样的表现特征,就文学的社会作用(或阅读效应)而言,作为一种创作原则的现实主义现在已经被置换成为了一种极富感性色彩的“生活化”原理,现实主义实际上已经被无奈地屈就于一种被称之为“现实感”的东西。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虽然确实有所揭示,但其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4]

但是,与其借助于文学来表达一种“想象性”的感怀,还不如通过文学来把握那种隐藏在社会群体

心理背后的人性问题,这一点正是楚荷小说与之前的以“现实主义回归”来指称的各种小说之间的根本区别。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楚荷的小说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与再认识,而之前的小说则是对生活现象的发现与再发现。

个人的生活故事可以折射出时代的社会矛盾,楚荷的小说在折射这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方面是全面的。就他的中短篇小说而言,《落地为兄弟》所描写的是工厂里的工友们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但从这些人际关系中折射出来的社会矛盾是“改革”方面的问题。《老莫》所描写的是家庭生活,而从这个生活中折射出来的社会矛盾则是“就业难”的问题。同样,在其它的小说中,被折射出来的社会矛盾有年青一代的“堕落”问题(如中篇小说《菊子》),有清闲无聊人士们的“网恋”问题(如中篇小说《庖丁解牛》),有普遍存在、见怪不怪的感情“出轨”问题(如中篇小说《归去来》),有神志不清的富有梦幻色彩的“追星”问题(如短篇小说《月女》)。虽然生活中到处都有不公正,不合理,但是,对于这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冷漠才是构筑生活内容的真正的材料。似乎所有的人都能够轻松自如地摆脱所有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并能够轻松自如地拥有自己的幸福感。在《月女》中,女儿从妈妈那获得了一张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她饱受了幸福的喜悦。门票丢失了,她只是独自责怪自己,因为她不愿意冷落妈妈的一片真情厚爱。从这个意义上说,月女尽管很伤心,但这样的“伤心”更应当是一种富有诗意的欣慰。在《老莫》中,找不到工作的老莫,并没有感觉到隐藏在“就业难”这个社会现象里的当代的价值取向,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不劳而获?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适应当代社会中的人才标准?这些问题是应当要想到的,但是老莫没有想到,小莫也没有想到,在这样的社会里,似乎去想这样的问题是多此一举的。无论生活的道路多么地艰辛,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种艰辛的可怕,更不可能想到那个精心策划、巧妙安排、极力加剧着这个“艰辛”局面的社会。因为心目中的希望就像是晴雨天的相互转换一样,总以为迟早会有机会落在自己的头上。在小说《菊子》中,由于菊子所向往着的公务员确实改变了自己,所以她对公务员的向往永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虽然在男朋友柯子看来,可恶的公务员,可恶的政府官员破坏了他和菊子之间的纯朴的

友情,但是,柯子认为,这只是发生在他和菊子身上的一件个别的事。由于是一件针对“个人”的问题,所以就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当大祸临头,官民之间发生了凶杀案的时候,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只是看客,都只是听众,没有人感觉到意外,没有人对此表示疑惑,正如没有人对此表示愤怒的那样。实际上,这就是集体对于社会现象的无意识的冷漠。

三

总之,楚荷的小说具有这样的一种寓意。虽然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人们能够看到多少个“问题”,而在于中国的国民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态”。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道理就是:“问题”决定不了人们的行为,而“心态”却能够决定人们的行为。楚荷的小说并不是通过描绘一些有关人的“生命”的故事来展示当代社会的“生活”原理。进一步说,楚荷的小说所展示出来的内容不是琐碎细微的针对社会生活的个体感性经验,而是揭示出了一种被社会锻造着的国民心态。这种国民心态的形成与发展是无声无息的,也是无处不在的。它不是来自某种有意识的价值判断,也不是由于某种特定的针对人生意义的正面阐述,而是一种针对社会乱象的无意识的集体参与,这种无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群体的失语症。

不同的文化环境以及不同的民族传统当然能够引发各不相同的集体无意识,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民族性”与“文化性”能否成为集体无意识问题的归结点呢?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从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来界定文化以及人类的类型(就像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那样)永远揭示不了集体无意识的复杂性。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也就是说,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来探讨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特征,才能够体现出这个“探讨”的意义和价值。楚荷的小说正体现出了这一点,他的小说不是抽象的人性分析,也不是抽象的心理分析,更不是针对“集体无意识”这一概念的叙述游戏,而是文学的社会学视域的一种拓展。如果把近20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看作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不断深化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楚荷通过他自己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一种大胆的实践性的开创。

所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都只不过是文学表达的一种手段,真正的创作目的则是为了能够了解

社会的性质,而社会的性质必然包含了有关人类的理性精神、价值判断以及审美倾向性等这样一些方面。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揭示,那么,再好的技巧,再好的风格特色也不过是一种趣味化了的智慧显示,是文本自身的欢悦与嬉戏。楚荷的小说并没有直接触及到有关理性、判断、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小说在人物乃至故事内容的展开的过程中,却揭示出了这些问题的“严重缺失”的现象。

由于生活在当今社会中的各色人物根本没有针对思想、价值、精神这些方面的关注意识,所以,在那些无意识的具有“信号反应系统”机能的国民看来,社会的性质无非就是正盛行在生活当中的“世故”行情,楚荷的小说所揭示的正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楚荷的小说具有这样的作用,那就是在确立自己的价值准则之前,首先应当看到这个令人恐怖的集体无意识。正是由于楚荷的小说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他的小说绝没有弘扬、倡导、号召之类的功能,更没有那种高调的启蒙、启发、愤青者的色调。

社会运行所依靠的是体制或游戏规则,而所有的体制与游戏规则却是官方的精心设计。当这样的精心设计变得不可动摇、牢不可破的时候,国民就只好认为:既然是铁一样的事实,那么,这就是铁一样的客观规律。既然是铁一样的客观规律,那么,就必然是“应当的”。为什么生活在当今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愿意并且是有点儿十分惬意地把自己置身到这样一种被扭曲的价值观念里,任由它摧毁自己呢?因为中国人已经软了,并且是彻底地软了。为了能够进一步地引导国民的心态逐步走向无意识,体制操纵者继续向公众兜售、贩卖一些“人性论”话语。就像小说《落地为兄弟》这篇小说中的那些厂长们那样,以“兄弟”相称,并不是为了要争取平等,而是为了要能够平息各种可能会产生的不满情绪以及相互争斗的“邪念”。起初对于“改革”大为不满,牢骚满腹的伍子被重用、被提拔、被当上了保卫科长之后,立刻就反过来对先前的工友们(胡子等)说:“我现在是保卫科长,谁和经理过不去,和改革过不去,就是和我伍子过不去,今天谁也不能瞎胡闹了……今天这事儿就算了,我请弟兄

们喝酒去。我告诉你们,没有科长请你们喝酒的。我伍子知道,落地是兄弟,我请弟兄们喝酒去”。不管伍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还是一个很愚蠢的人,这都无关紧要,因为体制的要求就是这样,游戏的规则必须是这样。伍子通过无意识说出来的话并不只代表他自己,这些“话”所代表的正就是他所处的那个“职位”。可以设想:如果伍子的“会说话”是来自于领导们传授给他的工作能力,那么,这样的工作能力并不只是体现了伍子的领导们的聪明,而是那些领导的领导们的聪明。

由于在体制的操作之下,那些曾经的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以及立场问题、方向问题已经被彻底的根除,所以,民众所能够具有的也是仅有的一点儿理性意识,只能够表现为:既然是已经被消失了的,那就是落伍了的东西,既然是落伍了的东西,则就是落后的东西。假如有人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坚定的立场或信念并为之斗争的话,那么,就被指责为“极左”的遗风。宁可能信赖一种虚伪的“爱心”,也决不姑息某种实际的“斗争”。如果还需要一点点儿价值判断的主体性的话,那么,这个“主体性”的范围只能是体制之内的“适应能力”以及“应对能力”。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整个社会就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隐形的网,“网”住了所有的人的思维方式,也“网”住了所有的人的理性精神,对于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融入到集体无意识当中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从根本上讲,形势比人强,时代使然。

参考文献:

- [1] 楚 荷.老莫[M].小说界,2012(5).
- [2] 蔡 翔.90年代的小说和它的想象方式[M]//蔡翔.融入野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5.
- [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52.
- [4] 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27.

责任编辑:黄声波